

寻访

寻找小金子

任林举

开栏的话

岁月奔涌，那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历程，已熔铸进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拂去历史尘埃，一件件史料文物、一处处遗址遗迹，沉默却有力，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史诗从未远去。本报今起开设“寻访”栏目，以有温度、有深度的纪实笔触，打捞时光深处的英雄事迹，让伟大抗战精神永续，照亮民族复兴征程。

山深了，林深了，仿佛岁月也深了。人间六月芳菲尽，曾经开满鲜花的山上，如今已被重重叠叠的树木、浓浓淡淡的绿色完全覆盖。车在白山密林的小路上缓慢盘旋，很像行进在幽暗的时光隧道之中。车窗外的树木以及山体上明暗交错的光影变幻不停，却始终拂不去凝在我心头的那个意绪难平的画面。

那是我刚刚在吉林通化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里看到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排破旧的民房。照片上有着几种不同身份的人。从着装和身份上辨认、判断，站在后排的是一些西装革履或穿着正规日本军服的人、军曹或军官，其中有一人手里还握着军刀。当初，这张照片从伪满档案中被发现的时候，并没有详细说明，只是与抗战英烈王凤阁被捕这条消息以及相关资料堆放在一起。而坐在最前排的人，身份最好辨别的就是王凤阁夫妇二人，其他几个身着普通棉服、戴着棉帽的人应该是与王凤阁夫妇一同被捕的中国抗战士军。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大概有些炫耀的意味。那么难对付的一个抗战将领，一旦被捕，他们肯定要广泛宣传，一是要昭告天下，他们又“剿灭”了一股抗日力量，另外也要炫耀一下，“战果”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想通过这张照片把自己载入史册，大有一种猎人与猎物合影留念的得意。但在前排王凤阁将军的身边，却有一个十分明显也十分扎眼的缺口。很显然，是另一个人开始坐在那里，只是在最后按下快门之前被从照相机的镜头里拉了出去。

后来的专家们对这张照片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分析，认为那个缺口最有可能是王凤阁4岁幼子小金子的位置。如果将与自己为敌的抗战军人作为“战利品”或“猎物”摆在人们面

前炫耀，尚有一点军人的体面，那么连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童都不放过，是否就暴露出作为侵略者的虚伪、残忍、非正义和非人道？这样的照片流传到国际上，是否会受到广泛的谴责？被中国民众看到，是否会激发起中国人更加强烈的反战情绪与仇恨？大概有敏感的日本人在此关键时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怀着“销赃”的心理匆匆忙忙将小金子拉出画面。

这是一个历史的缺口、一个战争的缺口，也是一个人性和人道的缺口。是缺口，也是巨大的缺憾。因为这个缺口和缺憾，我感受到了它留在我内心的撕裂和疼痛。我决心回到时间或历史的上游，去追寻那些为今日和平、尊严与繁荣而流血牺牲的先烈们的足迹，以缅怀，以警醒，以敬畏，以奋发。

行至通化市通化县果松镇地界时，山上的植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本浓茂的椴、桦、栎、杨等阔叶树木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红松和杉树。红松，即果松。因为红松可以结出松塔，产出既富营养又美味可口的可食之“果”——松子，所以被当地人称之为果松。据果松镇人大原副主席杨君臣先生介绍，从前这一带因为盛产果松，被称为果松川，后来有了村庄，便叫果松村，村庄发展壮大，最后演变成了果松镇。

果松镇不仅盛产松子，还有丰富的矿藏，出产高品质的铁矿石，也出产珍稀药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人参。因为有丰富的资源，就有开发，就有争夺，有战争。为阻止日本侵略者在这里伐木、开矿、掠夺资源、残害民众，王凤阁烈士生前就以这一带为根据地，转战南北。将军的幼子小金子，就出生在离果松镇只有3.5公里的东明村。

东明村为小金子接生的老人已经不在了，我只能去寻访曾经寻访过那位老人的杨君臣先生。1974年他从通化市调到果松镇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听附近村民讲起王凤阁抗日的故事，深深为王凤阁的民族气节、英雄气概所感染，也深深为英雄一家的遭遇而悲伤。但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很多人对王凤阁并没有太多了解。于是，他开始在王凤阁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收集、整理那些罕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世人复原出一个立体全面的抗日民族英雄形象。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他走遍了方圆几百里的村镇、农舍，寻访了四五百名经历过抗战年代的老人，记下数十本采访日记。他说，一闭眼睛，王凤阁及其家人

的人生轨迹便立即浮现在眼前。

讲起王凤阁的故事，杨君臣更是如数家珍。据他讲，王凤阁少时家境殷实，可谓一方富户。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王凤阁早早地选择了军旅生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变卖家产，组织抗日武装。1932年5月，他率部加入辽宁民众自卫军，先后任第十九路军司令和第三方面军总指挥。

辽宁民众自卫军解散后，王凤阁仍在原防区坚持战斗。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率部转战临江、通化、辑安（今集安）交界处的大罗圈沟山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果松镇一带，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他不但率部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还主动寻找战机，歼灭小股敌人，组织大小几百战，直接威胁着日伪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使其如鲠在喉。

1937年3月，由于部队的分散和叛徒出卖，日伪军2000余人悄悄包围了王凤阁将军。25日夜，王凤阁率部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到27日下午，王凤阁退至六道沟大南岔，利用山形地势继续与敌死战。最后，因寡不敌众而落败。王凤阁左臂中弹骨折，腿部也受重伤，身边战士大部分牺牲，妻子张氏、4岁幼子小金子，以及身边战士8人与他一同被俘。

敌人为了招降这位叱咤风云的“抗日巨匪”，在通化有名的江东春饭店摆下酒席“宴请”王凤阁。王凤阁脸含微笑，走到主宾席前，一伸手把满桌子珍馐掀翻在地。然后露出凛然之色，大声怒斥：“日本侵略者是东北三千万民众的仇敌，我与你们不共戴天！”

王凤阁的妻子张氏和幼子小金子同时被关进监狱。小金子大名叫王金生，可惜从来没有机会使用过。从出生那天起，小金子就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为了引诱拉拢王凤阁的家属，日本宪兵队翻译横田，觉得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小金子一定对吃的东西充满渴望，便拿着日本干饭团送到小金子面前：“小孩，这是日本最好吃的御结（即握饭、饭团），你的‘米西米西’。”

没想到，小金子竟然一边用小手往外推，一边说：“我不吃日本饭！我不吃亡国奴饭！”一个4岁的稚子，竟如此深明民族大义，令日本侵略者十分震惊，也十分胆寒。如果让这样的孩子长大，一定又多了一个他们无法争取的敌人。于是，日本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把小金子“不吃满洲饭”一事，记载在日伪档案里。

面对敌人的劝降、刑讯，王凤阁坚强不屈、

严词斥责。日军在劝降无果的情况下，决定杀害王凤阁一家。1937年4月6日，日军对通化实行全城戒严。王凤阁将军和妻子张氏、幼子小金子同赴日军在通化玉皇山下柳条沟口设下的刑场。

多年从事党史和抗战史研究的马会凤告诉我，至上世纪末，通化市还有一些王凤阁就义现场的目击者。其中赵文生、迟氏等人的口述史《王凤阁将军就义的那一天》，她反复阅读、研究过。那一天，人们亲眼看到了王凤阁慷慨激昂地对群众演讲。他一边与乡亲们道别，一边大声鼓励民众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继续战斗下去，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人们也亲眼看见王凤阁将军拒绝下跪，坐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土坑边，被日本鬼子用军刀砍下了头颅。

在讲到小金子就义的情景时，杨君臣突然哽咽语塞，一度无法继续讲述。

用军刀杀害了王凤阁之后，另一个行刑者山根曹长端着枪对准了将军的妻子张氏和幼子小金子。小金子望着妈妈流泪的眼睛，安慰妈妈说：“妈妈，我不怕，你抱紧点我！”然后，把头埋进妈妈的怀中。

枪响了，张氏首先倒在血泊中，小金子大哭着爬向母亲，毕竟还是一个刚刚4岁的孩子，怎能不害怕呢？让人心疼啊！大约是鬼子的手也在颤抖吧！连开两枪都没有打中小金子，开了第三枪，小金子才没了气息。

马会凤站在玉皇山下某部队大院门前，神情凄凉。那里是王凤阁烈士一家的殉难地。她指了指院墙外那条涓涓小溪，红着眼睛说：“这就是柳条沟。”

柳条沟的溪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泛起哀伤的涟漪。溪流虽小，却呈现出永无穷尽的流动之姿，清清亮亮的水流，就像不曾断流的岁月，一直流向无限的远方。离柳条沟不远处，有一所佟江小学，此时，正值间休，孩子们欢呼着冲出教室，一院子的孩子，活脱脱一簇无忧无虑尽情开放的花朵，自由、绚丽、芬芳。

望着满院幸福快乐的孩子们，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小金子。如果他能晚出生几十年，也会跟现在的孩子们一样，有白米饭加上四菜一汤、一瓶酸奶的午餐放在班级的门口等着他享用，还有好看的衣服可穿。每天，他面对的都将是父母、老师的鼓励和表扬，而不是侵略者的呵斥、闪着寒光的军刀，以及不一定能感觉到疼痛却一定会流血、送命的枪……

在文学写作中是否该运用方言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表面上看这是作家的个人选择，但其实也涉及对文学、时代与语言的深层理解。

方言联系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更贴近创作者的生命体验，鲜活生动，在艺术表达上更具风格化，因而为一些创作者所推崇。但方言的运用也限制了作品的传播范围。《红楼梦》《水浒传》虽然有一些方言，主体还是古典白话，就比主要以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更具普遍性，流传更广。

现代以来，鲁迅、茅盾、老舍的小说也有一些方言因素，但主体是现代白话。赵树理小说中方言土语更多，读起来却很顺畅，这与他大众化的文学追求密切相关——“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运用东北方言，在《山乡巨变》中运用湖南方言，以贴近当地的情风貌。柳青在《创业史》中叙述语言使用书面语，人物语言则融入了陕西方言，兼有史诗的庄严和生活的生动。无论鲁迅还是赵树理等人，其实都处于同一时空，面对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一个现代汉语和普通话尚未得到充分推广的时代，他们面对的是各地不同方言的读者，他们需要克服或穿越不同的方言，所以他们的文学语言虽然汲取了方言因素，更主要的却是普遍性和大众化的追求。

新时期以来，作家写作具有了语言自觉。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余华等作家就在文章中抱怨过，他们身为南方作家，在写作中不得不把方言“翻译”成现代汉语，这让他们在构思与创作中多了一层困难。但同时，这也形成了他们更趋于书面语的独特叙述风格。这种更加纯粹的文学语言，甚至会让一些具有方言色彩的作家感到羡慕，比如王朔就讨论过孙甘露的语言，认为“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但在语言自觉的浪潮中，有一些作家的探索走向了极端：一种是大量使用方言土语，需要加上连篇累牍的注释才能读懂，这样方言的运用并没有抵达大众，反而阻碍了与大众的沟通；另一种则是书面语的极端化，满纸翻译腔，他们的语言成了某种“信息空转”，虽然突显了作家的个性，但终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也有作家另辟蹊径，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就“以方言为方法”，在对语言、方言、世界、思维的讨论中重构了一个艺术世界。

在我们这个时代，方言问题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的焦点是不同方言区的人是否能够交流，为此，党和国家大力推广现代汉语和普通话；那么在推广数十年取得非凡效果，交流的问题解决之后，现在的焦点就变成了是否应该保护方言的问题。方言关联着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如果任其消失，那么各个地方失去了其独特性，国家也会失去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近年来，“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作家群”等蔚为大观，方言写作成为其中重要的因素，比如石一枫的小说既有京味儿，也蕴含着鲜活的时代气息，蔡崇达的作品既有闽南的文化与语言特色，也有对小人物命运的思考。对于新时代作家来说，如何经由方言的特殊性讲述中国故事，或者反过来，如何在对时代的描绘中保留方言的独特性，都值得探索。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本版仅接受原创首发，谢绝一稿多投。



▲水彩画《林间》，
作者庞薰琹，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县城十字街心有一棵黄葛树，冠如大伞。伞立街心，形成转盘，车辆围着伞自然分流到东西南北街。

黄葛树下，坐一棋盘。经常有人来树下下棋。两人下棋，四五人指挥。跳马、走车、飞象，七嘴八舌，不晓得听谁的。

黄葛树下有人看下棋，也有人看车流。老张坐在磨光的树根上，眯着一双眼睛，看过往车辆的尾灯。黄葛树上还有一窝麻雀。

老张拉了拉我的手说：麻雀在叫醒树叶呢。

我一惊，继而点了点头。

一棵树不出例外，一辈子都会待在一个地方。城市更新，道路改来改去，这棵黄葛树一直在这里。老张说：

树就是交警呢。开车的人，看到这棵黄葛树，就自然慢下来。

街心道路拓宽，黄葛树不得不搬走。听说黄葛树要搬走，老张一伙人不干了，天

天守在黄葛树下。黄葛树上百年了，比我们还老呢，真正的“原住民”，咋能说搬走就搬走。

挖掘机开到树下，老张一伙人守在树下不走，也不闹。还是好好谈。向老张他们谈城市规划图，谈长远发展。最后，老张他们同意了。提出一个要求，必须移栽活。

保证移栽成活，交给林业专家。移栽仪式就交给老张他们。老张一伙人向黄葛树行礼，再给黄葛树讲述这里偏僻，请它去一个宽敞的地方，让它不要认生。然后给大树剔去枝干，用红布头包好。

他们用双手刨开树根下的泥土，边刨边说：好哥们，我们请你了。手一挥，这才让挖掘机进场。黄葛树挖起

一棵树的仪式

李

来时，老张又赶紧上前把树根包好，再用红布头包上老子。最动人的仪式在心里。老张一声不吭地做着这一切。

搬去滨江绿道的黄葛树，老张他们天天去照看。发现有一点异样，就要找林业专家来处理。林业专家笑着说：树没有人那么娇气呢。老张也笑着说：这树可比人贵重呢。

每天上班，我都从滨江黄葛树下走过。黄葛树在老张们精心呵护下发出了新枝。老张他们又开始坐在树下乘凉、摆棋阵了。

一天，我办公室窗外生出几片绿叶来。好生惊奇，赶紧跑到窗下看个究竟。我办公室窗台上竟长出一棵小黄葛树来。记得前些年，几只鸟雀跳到窗台上，叽叽喳喳叫了好一阵子。难道是这些鸟雀把黄葛树果实种在了这里？

小黄葛树一米多高，这家伙在我窗外应该生长两三年了。树根裸露在外，紧紧抓住砖缝，死死抱紧那浅浅的尘土。空调出水管正好落在窗台上，空调出水就成了它的灌溉水。冬天树叶落下来，就积在树下保暖。

我赶紧推开窗户，用一杯凉水浇过去。再细看，小黄葛树的根遍布窗台的所有缝隙，努力吸收仅有的一点点养分。水浇下去，突然腾起点点灰尘，阳光越过窗台照过来，这是多么好的清晨。

我一下子理解了一个人和一棵树的感情。



赞美

何向阳

婴儿时我尚不懂赞美
当你的嘴唇轻触
我的双眉

少年时我尚不懂赞美
碗里的苦药经你吹拂
竟有丝丝甜味

青年时我尚不懂赞美
看到我拿回的奖杯

你微笑的眼睛含着的
那一颗泪

中年时这尘世已没有你
灼烫的额头只能将你的手温
细细回味

为什么
与你相处的漫长岁月
我竟不懂赞美



3年前，在网上买旧书，有缘结识了一位店主，原来是同城人，邀我去她旧书店看看。到地儿一看，大吃一惊，哪是什么书店，简直就是一个商场。虽说位于城郊接合部的背街，但四五百平方米的临街门面房里排满了铜质书架，架上的旧书琳琅满目。两个工人正忙着编号、录入电脑、上架……

交谈后得知，女店主是开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的，生意做得很大，附近几个县回收的废纸都送来。经过分类、打包压缩后，他们再转卖、运往各地的造纸厂。不用说，废纸中有大量的书籍，甚至有些没拆封，引来很多旧书店主上门购买。虽说仍是论斤卖，价格却比废纸高出十倍。卖了一段时间后，女店主开窍了，自己开网店卖起旧书来。

我在她网店买过一本《云阳县航运志》，薄薄几十页，定价几分钱，我却付了80元，价格翻了好几倍。但我心甘情愿。这书市面上很难找到，几乎为孤本，写作《川江船志》时给我帮助不少。谈起这事，女店主说她也高兴，赚钱的同时，为一本旧书找到了好去处。这话说得好！

后来，我又在她网店购得一本《云安汤溪河斜张桥简介》，为手刻蜡纸油印的小册子，1975年1月由当时四川的5个单位联合编印，总计27页，品相非常好。云安汤溪河斜张桥是我国第一座斜拉桥，1978年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云安镇是我童年生长的地方，建桥时，各居委会组织群众淘洗鹅卵石，义务提供混凝土石料。当年我跟小伙伴们一起也参加了这个劳动。当我在网上看到这本小册子时，毫不犹豫下了单，虽然价格也是略贵。小册子很薄，纸脆，我特意夹在厚厚的大开本《云安镇志》里，这样找起来方便。

有一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则消息，编印这本小册子的重庆某设计单位要设立院史馆，征集藏品。斜张桥是该院当年的科研项目，我觉得由他们来保管、展示这本小册子，比我夹在书里有意义得多。于是，我拍照、扫描，留下一份电子文档后，将小册子快递过去，捐给了设计单位。院史馆开馆时，给我颁发了一张精美的收藏证书。

我跟女店主学习，也为一本旧书找到一个好去处。

我主要是在网上买旧书，也常去旧书店选二手书，多为地方史料和笔记小说，藏书大约一两千册。每次拿书回家都是悄悄的，生怕妻子看到了，她又会唠叨：“家里已经堆不下了。”确实，家里书多了也是麻烦事。

我的朋友蒋老师，20多岁开始系统性地买书，已逾30年，家里的书柜、桌椅、墙角都被堆满。一次